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工人干部的培养与提拔

□ 李 葳

新 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提拔了大量的工人干部,并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对工人干部的培养工作,对增强干群关系、巩固基层政权、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进,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本文对该时期党的工人干部培养及提拔工作进行了历史回顾和考察。

一、工人干部提拔标准与方法

干部工作路线决定于国家的性质,带有很强的阶级性。新中国成立初期,提拔工人干部的标准大体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德才兼备;二是密切联系群众。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对干部的“德”“才”有不同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面临着新的形式和新的任务。根据这种新的要求,党章中专门列了“党的干部”一章,对干部的标准作了规定。

1953年11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指出,在提拔干部的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党的根据政治品质(德)和业务能力(才)来挑选干部的原则;必须反对保守思想、本位主义、资格论、重才轻德、任人唯亲等偏向。

两年后,随着事业的发展,对干部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把“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具体化为“必须挑选那些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的,能否忠实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有一定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的,熟悉业务或能否钻研业务的,对新鲜事物有敏锐的感觉和能够支持新生力量的人,担负各方面的各种领导任务。”^[1]

德才兼备是主导这一时期选拔标准的主要方面。“‘德’的最高要求,就是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高度的政治觉悟,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所谓‘才’,就是干部办事的才能,要求干部要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能担任某一种具体的工作,或者基本上能胜任而有培养前途的。”^[2]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如果一个人具备了对社会主义事业抱无限忠诚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品质,就有可能通

过刻苦虚心的学习,逐渐地提高自己,从而取得更好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做好工作的业务能力。”^[3]可见,“才”是以“德”为基础的,“德”是一切衡量标准中的重中之重。这一时期的干部是在“德”的基础上量“才”而选的。

被提拔的工人大多是生产战线上的优秀工作者,密切联系群众,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党的工作的根本工作方法就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提拔工人干部的标准中,密切联系群众、心系群众也是一条重要的选拔标准。例如,彭仰钦是一位有着30多年工龄的武汉市老工人,解放后入党,1950年他被提拔为武汉冶电业局第六发电厂厂长。“他不像过去的那些‘厂长老爷’一样摆官架子”。彭仰钦曾这样说:“我自己是一个工人出身,亲身体会到从前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所以今天我们工人自己当了厂长当了家,就不应该忘本。”^[4]而当时武汉市第一纱厂的做法是:提拔工人干部之前,调积极分子做一个时期的工会工作,使他们“树立群众观点,养成民主作风,防止在提拔后可能产生的高高在上或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等作风。”^[5]

提拔工人干部的方法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方法。首先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小组推荐提拔对象,经评比确定后交车间支部通过,公示征求群众意见,最后按干部管理手续,送上级领导机关审查批准。这种方法“既可以正确地挑选人才,又可以使干部更深刻地认识必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这种方法通常能够提拔业务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干部,同时教育了广大群众。另一种是“领导提名、群众通过”的方法。“由领导上根据技术和各方面表现,提出名单,由群众讨论,然后再由领导上决定。”^[6]这种方法实施的关键是要经过充分的群众讨论,否则因其行政性的方式,这种方法常常不易得到群众的拥护,提拔起来的工人干部工作开展也相应受到影响。^[7]被提拔的工人干部通常在本企业内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然后再逐渐输送到本企业以外的工种工作岗位上去。”^[8]

* 本文为朱汉国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 10&ZD077。

二、工人干部培养途径和内容

关于培养干部的问题,1954年7月邓小平曾作出这样的指示:“办好学校,培养干部,才是最基本的建设。现在,有的部门已有几十万员工,几十所学校,他们不去办好这些学校,却总希望从外面调人。应该主要靠自己培养干部。”^[9]由此确定了提拔干部要靠“自己培养”而不是“伸手要人”的工作方法。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技术力量的不足和技术管理的不善,也是工业方面的重要问题。”“在这个情况下必须更加合理地有效地使用和提高现有的技术人才,加强技术组织工作和在企业中培养技术人才的工作……”^[10]对于新建厂矿所需的各类人员,薄一波同志强调“主要应在工作中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11]

在这样的方针、政策下,德才兼备不仅成为党挑选干部的标准,同样也是党培养干部的目标。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向党的干部提出了新形势下的要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12]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仿效苏联建立了业余补习学校。1949年10月10日,华北大学业余补习学校开学之际,聂真教务长说:“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我们要向苏联学习办好业余学校,使每一个人都有工作而且有文化,有理论。”^[13]

一般新提拔的工人干部的特点是熟悉业务,与工人联系密切,工作热情肯干,但也有文化水平较低、技术理论缺乏、工作方法不足等问题。正如工业劳动模范董振远、刘立富给《人民日报》写信提到的:“‘三反’运动后,我们工厂提拔了大批工人干部。工人干部的文化水平很低,业务能力也需要提高,因此迫切需要学习。”工业劳动模范张柏芳认为,“我们只搞生产而不学习,是不对的。不学习,就不能提高政治、文化和技术水平,就不能很好地进行生产。”^[14]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素质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有大量的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很低,阻碍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提高,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十分重视干部的文化教育工作,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逐步提高到相当于高小以至初中毕业的水平。^[15]

针对这些问题,各地陆续开展了对工人干部的培养工作。具体来看,培养工人干部的途径主要有:

首先开办职工学校、业余学校,增加各类学校学生中的工人成分。通过正常的学校教育途径,有计划地抽调干部离职进行正规的学习和训练,加强对干部的继续培养工作。截至1950年3月,“河北、平原、山西、察哈尔等四省的省级和专区和县级机关,已开办业余文

化补习学校345所,入学干部(内有部分勤杂人员)共45,300余人。”“各校都按学员程度划分为初小、高小、初中三部。计划在三年至五年的业余时间,使文化程度最低的干部,也能达到初中毕业的程度。”^[16]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了《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对学习年限、入学条件、师资配备等作出指示。并且为了“奖励优秀的工农干部及产业工人入学”,规定“凡对离职学习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其原有的军龄、工龄应继续计算。”^[17]1951年,教育部颁发了《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对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具体工作作出规定。^[18]

通过业余教育,工人干部不仅可以完成小学、中学、高中的教育,而且可以进入业余大学学习,接受高等教育。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招收产业工人入校学习。“大部分工人因文化水平较低,先入预科补习文化;一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则直接进入本科。”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四百四十余名毕业生中,有五十余人是工人,占全部毕业生的百分之十二”。^[19]

其次,领导上具体、细致地布置工作,以带徒弟的方式予以锻炼。哈尔滨市“香坊区工会办事处布置工作时,起初只把方针原则布置下去,结果新干部没办法,工作情况也不能反映上来。以后该处布置工作时力求具体细致,提高了新干部的工作信心,很好地完成了任务。”^[20]济南市也是采取这样的方式对新干部进行教育,“工会各种会议,叫新干部轮流主持;讨论工作制定计划时,老干部帮助指导办法”^[21]。

第三,在日常实际工作或某一运动中培养和教育干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拔工人干部主要是结合各种运动进行的,尤其是在抗美援朝、“三反”运动中,挑选优秀分子,经过考察和培养,运动结束后提拔其中的优秀人才。武汉市第一纱厂“从各种运动中,发现和挑选历史清楚、工作积极、作风正派、联系群众和有培养前途的积极分子,作为培养和提拔的对象。然后有意识地让这些积极分子到各种运动中去锻炼、提高,党组织随时注意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22]到1952年底,北京市“共有脱产工会干部1681人”,“这些干部中约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经过工厂接管、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斗争的锻炼,从工人中新提拔的。”^[23]

第四,举办座谈会、外出参观学习。昆明电工器材厂召集新提拔的工人干部开座谈会,“介绍好的工作方法,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有些信心不高的新干部,在座谈会上得到了领导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也提高了工作信心,改进了自己的业务。”^[24]通过交流工作经验,新提拔的工人干部学习了先进的工作方法。“党为了培养彭仰钦同志更好的管理生产,吸收先进经验,曾派他先后到华北唐山、石景山等地和到苏联

去参观和学习”。^[25]参观学习也是党培养工人干部的一种直接有效的方法。

在培养内容上,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告》颁布后,稳定干部的职务,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领导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成为干部工作的中心。1956年12月,中央组织部在京召开各省、市委组织部长会议。安子文在会议上总结提出:今后干部工作方针是稳定和提高干部的方针。干部稳定下来,才能更好地熟悉情况,钻研业务,积累经验,做好工作。稳定,包括在一定的“行业”中稳定下来,实行干部专业化。干部训练工作的方针是加强领导,提高质量。应当积极地、有计划地配备、培养教学人员,认真办好各级党校、专业干部学校和文化学校。并指出干部训练费拨给一亿三千万。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拟定为八千万元,并从结余党费中补助一部分。^[26]

培养工人干部的工作中,政治思想教育是最重要的方面。1961年,华北局关于干部训练工作安排如此批示,工人干部“一般熟悉生产业务,有较高的政治热情,但缺乏必要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知识,工作方法简单。加强对这些干部的训练工作,不仅是当前工作的必需,而且是有计划地培养大批工农干部的一个重要措施。”由此,“对于第一线干部的训练内容,主要是学习党的基本政策、工作方法和党的建设。”^[27]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工人干部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地位的认识,强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同。

提高文化水平是工人干部继续培养工作的基础。“从工人中提拔的文化较低的技术干部,应先学文化,为进一步学习技术理论打下基础。”^[28]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新干部文化程度低、写算吃力等困难”,结合扫盲运动,“将新提拔的工人干部编入速成识字班学习”。

提高业务水平则是培养的重要内容,以解决“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和业务水平的提高赶上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29]的突出矛盾。学习目的在于使干部思想明确,在党的领导下对生产负完全责任,真正成为生产运动的具体组织者与领导者,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进。

中共通过以上方法加强对干部培养和教育工作,目的在于“迅速地把干部提高到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适应的水平上来”^[30],以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及对新政权的认同。

三、培养、提拔工人干部的意义及问题分析

从总体上来看,培养和提拔工人干部的工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培养和提拔工人干部的工作对解决解放初

期干部缺乏的困难和保证完成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起了重要作用。1956年1月,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全国省市以上各专业部门在职干部轮训工作向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省、市以上共有干部学校和训练班347所,几年来共约训练了127万多人。^[31]大量的工人干部一方面充实了干部队伍,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干部队伍建设,巩固了基层力量;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党对生产的领导,对生产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这一时期针对工人干部的选拔标准与单纯依靠资历、宗派主义和重才轻德的提拔干部的方法相比有很大的进步性,尤其是在摧毁了国民党旧的国家机构后,迅速地建立起新的国家机构,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正如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组织工作会议上所说的:“选择干部的条件是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根据实践,从实践中看一个干部是否忠实于党,忠实于革命事业,是否有工作能力。离开这些,根据资格、党龄,甚至根据同乡、亲戚等关系来选择干部,都是错误的。”^[32]

最后,新中国成立后,身分社会逐渐形成。一些新的政治身分,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成为新的身分传统。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先定的家庭出身和按照政治态度划分的阶级成分。^[33]“农民不如工人,工人不如干部”,这些身分一旦确立就很难改变,且两种身分在工资、住房、医疗、退休等福利待遇方面有很大差别,绝大多数人的命运都受其影响。工人被提拔为干部则打破了出身的限制,是对身分藩篱的突破。

各省市在培养和提拔工人干部的工作取得成绩,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关门主义的现象。有一部分领导部门提拔生产中的积极分子不够大胆,“甚至一部分老干部看到工人或低级职员被提拔就表示不满,和新干部比薪金、比待遇、闹宗派。”^[34]对提拔和培养工人干部的工作认识不够,阻碍了工作的进行。

对工人干部使用不当。技术工人被提拔后却担任非技术工作。有的工人生产积极,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却被提拔到机关工作。如武汉市第一纱厂“有三十多个五级以上的技术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调出厂或本厂内作一般的行政、党务、青年团的工作,而没有做到专材专用,发挥他们的技术特长”^[35]。西南纺织局“六一一纱厂原调部透平车间的老技术工人申占魁,‘三反’后调到供应科当采购员。有些部门不给新干部分配工作,把他们当作打杂工人。”^[36]

被提拔的工人干部社会工作过多,影响工作和生活。“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优秀工人,提拔当干部以后,便都担任了四五种兼职,有的甚至兼职十种以上,经常忙于出席各种会议,很少有时间学习业务,对工作和健康

都影响很大。”^[37]

对干部提拔政策把握不到位。“有的工人仅仅在文化娱乐活动方面积极,就被提拔了,造成不好结果。”^[38]很多地方缺乏细致的思想工作,忽视宣传、动员工作,提拔方式生硬,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有些厂甚至不事先通知,临时把工人从车间里喊出来,就要他担任新职务,使被提拔的工人感到莫名其妙”^[39]。

这种种不足,都影响了工人干部培养和提拔工作的深入开展。因为上述情况,有的新提拔的工人干部滋生了消极情绪。有些人认为自己“在生产岗位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但提拔为干部后发挥不了作用”。“许多新提拔的工人干部要求仍回车间去。也有些工人认为当了干部后,再也不能创造先进工作法,再也不能当劳动模范,再也没有机会去苏联和北京了,因此认为当干部不光荣。”^[40]

培养和提拔工人干部的工作所暴露出的问题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总体上看,提拔工人干部的政策是党的干部工作路线的体现,目的在于调整干部成分、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培养和提拔工人干部增强了领导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巩固了基层政权建设,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与国家建设各项事业的前进。

[1]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给中央的工作报告》。

[2]牛卫中编:《什么是党的干部政策》,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

[3][29]刘汉清等:《干部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5、6页。

[4]《优秀的工人厂长——共产党员彭仰钦》,《新武汉报》1952年7月17日,转引自《被选拔的工人干部》,中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页。

[5][22][35]《武汉市第一纱厂党组织培养和提拔工人干部的经验》,《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9日第3版。

[6][21][34][38]《济南培养工人干部 一年来提拔九百名》,《人民日报》1950年1月17日第3版。

[7]《上海若干国营工厂提拔工人干部的初步经验》,《人民日报》1952年8月26日第3版。

[8]《关于干部的教育、培养、提拔的问题》(1951年4月6日),韩劲草主编:《安子文组织工作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

[9]《办好学校,培养干部》(一九五四年七月九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10]《政府工作报告(之二)》,《人民日报》1954年9月24日第2版。

[11]薄一波:《当前基本建设中的几个问题》(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

[13]《华大工会业余学校开学 成仿吾、聂真讲话 号召学习苏联经验,培养大批工农干部》,《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2日第4版。

[14]《希望有关部门解决工人干部的学习问题》,《人民日报》1952年5月15日第2版。

[15][26][31]《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479-480、469页。

[16]《华北各省、县级机关设补习学校三百所 四万工农干部入学 一年来成绩显著 创重要经验》,《人民日报》1950年3月11日第3版。

[17]《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人民日报》1950年2月20日。

[18]《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人民日报》1951年2月17日第3版。

[19]《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培养了第一批工人干部》,《人民日报》1953年9月30日第3版。

[20]《哈市总工会三年来提拔数千工人干部 发电厂劳动英雄刘英源现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人民日报》1950年1月26日第3版。

[23]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北京志·人民团体卷·工人组织志》,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24]《昆明电工器材厂提拔的工人干部迅速学会生产管理技术》,《人民日报》1952年4月19日第1版。

[25]《优秀的工人厂长——共产党员彭仰钦》,《新武汉报》1952年7月17日,转引自《被选拔的工人干部》,中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页。

[27]《中共北京市委对市委宣传部关于北京市1961年宣传工作计划纲要及全市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指示》(1961年3月9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1年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28]《中共北京市委批市委组织部关于1955年组织工作意见的通知》(1955年5月30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5年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381页。

[30]田洪德:《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培养和提高干部》,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32]《党的组织工作的几个问题》(1954年4月1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年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33]陈刚:《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36][37][39][40]《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所属各厂忽视对新提拔的工人干部进行培养教育》,《人民日报》1953年2月6日第2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100875)